

收藏：石鸥

编著：石鸥 吴小鸥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1949—2009



湖南教育出版社

收藏：石鸥 编著：石鸥 吴小鸥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1949—2009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1949—2009/石鸥编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55-6312-5

I. 百… II. 石… III. 教材-编写-史料-中国-1949—
2009 IV. 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69703 号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1949—2009

收藏: 石 鸥

编著: 石 鸥

吴小鸥

责任编辑: 杨新援 刘 芳

责任校对: 曾朝晖 李 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27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9×1194 12 开 印张: 40 字数: 825 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55-6312-5

G·6307 定价: 220.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新中国 60 年教科书发展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不同时代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小学教科书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编写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基础教育教学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促使教科书质量不断提高。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中小学教科书建设与其他各项教育事业一道，不断克服困难，走过艰辛，昂然走过了 60 年光辉而不平凡的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中小学教科书的过渡与统一（1949—1966）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民政府对学校教育提出“维持现状、立即开学”^①的要求。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量大而时间紧迫，工作十分繁重，

于是基本策略是有选择地沿用、有重点地改编老解放区的课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旧课本。迅速出版和及时供应，一般是由新华书店负责，各地印行。

1.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渐次统一并全国通用

1949 年 3 月，中央指示出版工作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②当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地课程标准不一致，基本都是自编自印教科书。1949 年 4 月华北人民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委员。1949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给武汉市

① 语文课程与教学网 [EB/OL].http://ywjjxw.lsxy.com/pl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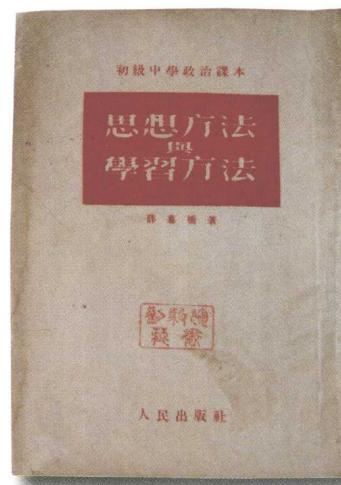
② 黄洛峰.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 [J]// 宋原放，主编. 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上册）[M]. 方厚枢，辑注.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8

委宣传部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地区差别之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华北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①

1949年7月作为教科书主要出版印刷单位的华北联合出版社与上海联合出版社相继成立。仅仅2个多月时间，两家出版社就已经赶印出约1000万本中小学教科书。^②这些教材与各地新华书店及书坊出版发行的教材一起使用，奠定了新中国教科书发展的基础。

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全国新华书店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上指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③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设立编审局，调集部分老解放区、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单位的编辑人员编审文史地教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在统一编辑的教科书尚未编成之前，先由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会同拟订中小学教科书用书目录，发到各大行政区的文教部（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教科书必须统一采用目录中所列各书。同时，成立国家统一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

1950年12月，人民教育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小学教科书问题给武汉市委宣传部的指示（1949年7月10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70

^② 黄洛峰.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J]//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三卷上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5

^③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3~4



出版社一成立便开始承担华北、华东地区1951年春季中小学教材的生产造货供应工作，并统一向其他地区新华书店供



应纸型，分区造货供应。1951年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出版总署制定的《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中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① 1951年4月16日，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关于1951



年秋季教科用书的决定》，在这些中小学教科书中，除高中部分教科书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外，其余绝大多数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供应。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代教育部拟订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并开始编写十二年制教材。1955年该套新教材开始出版，1956年秋季在全国陆续使用。这套教材刚使用一年，便发现某些教材要求较高、内容较深，造成了教与学的过分紧张，于是，不得不先后对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和小学语文、历史、地理七门学科教材进行精简。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提出：“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和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②

1958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今后各地可以自编教材，教育部不再颁发教学用书表。各地出现对通用教科书进行大幅度修改并自编教科书的小高潮。

鉴于1958年各地自编教材中存在的质量问题，1959年6月教育部布置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写中小学教材。1960年下半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当时中小学适当缩短学制年限、适当控制学



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增加劳动的要求，赶编十年制中小学教材。这套教材于196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试行十年制的学校试用。

1961年4月11日，中央文教小组开会讨论中小学教材问题。会议决定，将已编好的十年制教材，供各地试用；待一定时期后，将其学习时间拉长为十二年，作为十二年制教材。教育部随之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人民教育出版社新

^① 课程教材研究所.教材制度沿革篇(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

^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28

编的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于1963年陆续出版，并于1963年秋季在全国十二年制的学校使用。但这套教材只出版了一部分，后根据毛泽东主席1964年2月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教育部于1964年5月发出《关于精简中小学各科教材的通知》，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教材还没有来得及出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2. 中小学教学改革的试验与探索教科书

新中国教科书在集中统一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否定多样化的试验，这主要

体现在各种试验教材和乡土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上。

第一，翻译试用苏联十年制中学教科书。1949年9月，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在东北第四次教育会议上指出：“提高中等教育需要学习苏联经验。”东北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论东北教育的改革》中讲到：“苏联的课本，是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编写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随后，东北教育部组织编译人员，根据苏联十年制教材，翻译改编了初高中自然科学新课本，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物理等，并从1950年起在东

北各地中学开始试用。^①这些教材对我国的教材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小学五年一贯制试验教科书。1951年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小学修业年限为5年，实行一贯制。为了配合1952年秋实行五年一贯制，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了小学语文和算术教材。但在全国推行以后，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对五年一贯制及相应教材的反映与批评比较强烈。

第三，中学语文的分科试验教科书。1951年3月胡乔木在第一次全国中学教育工作会议上就谈及中学语文应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1953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提出：“应当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独立学科进行教学。”1954年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写分科教学大纲。1955—1956学年度，部分文学、汉语教材在全国74所中学试教。1956年下期分科教材在全国全面实施，1958年上期停止使用。^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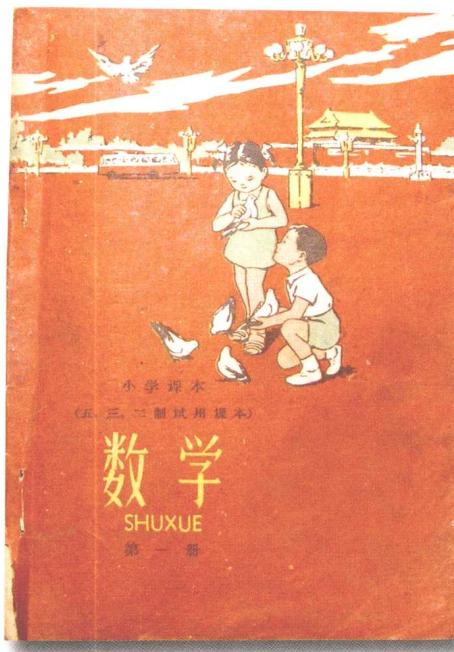
第四，缩短中小学学制改革试验教科书。1958年，在“大跃进”激进追求速度的思想影响下，各学校开始进行缩短学制的试验。相应的，教育界认为中小学教科书呈现出的主要问题是“少慢差费”现象。当时试验的新学制主要有：小学五年一贯制、中学五年一贯制；中



^①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全国通用教材中的中学数理化教科书，也基本上是以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译的这套教科书为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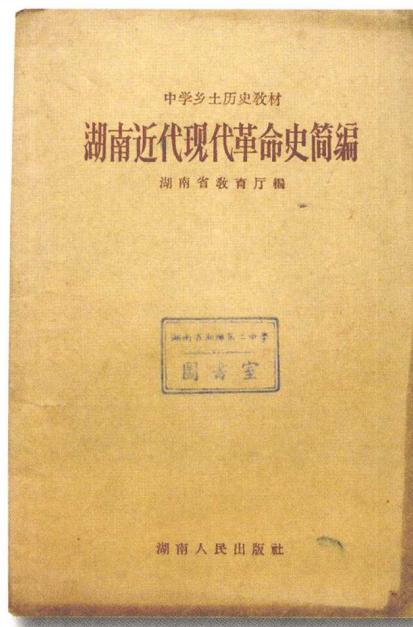
^② 1958年3月8日，教育部颁发了1958—1959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规定文学、汉语不再分科，仍称语文。1958年秋开始使用人教社1958年7月—1959年4月改编的“中学语文课本”。

小学七年、九年、十年一贯制，五三二制（一种十年制），九二制；中学四二制、三二制、二二制、四年制等等。根据试验学制，各种相关教材也开始编写与使用。如上海、江苏新编了十年制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常识四科教材；18个省和师范院校自编了全套或部分九年制、十年制中小学教材；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在1958年编写了一套“九年一贯制（全日制）”数学教材；1960年华北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写中小学语文（五三二制）部分教材；1960年湖南师范学院教学改革办公室编写了五年制中学试用课本《数学》等。



第五，乡土教材。1958年1月，教育部通知指出：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地理、历史、文学等科都要讲授乡土教材，同年《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乡土教材的

通知》颁布。从1958年到1965年大部分省市均编写了本省的乡土地理、乡土历史。



1949—1966年，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发展经历了渐次统一、自主试验的发展过程。在教材管理层面，“编审合一、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国定制教科书制度得以确立，但统一和通用并不否定多样化的试验教材。在教材编撰出版层面，在引进、学习、借鉴苏联教科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自编乡土教材、补充教材的探索中，初步解决了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以及与地方实际的结合等问题。教材建设不断取得突破。

二、“文化大革命”中小学教科书的无序与停滞（1966—1976）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其总的特征是，突出政治、削弱甚至否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否定以前的课程结构。这是课程结构与教材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具体表现是初期狂热的停课闹革命，接着是复课闹革命，中后期发生“逆转”，“左”渐降温，出现所谓1972年的“复旧”，但在“反复旧”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初期的狂热做法又重新出现。

1.“停课闹革命”，毛泽东著作成为基本教科书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时批示：中学所有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教育方针，不能再用。这些教材未印的均应停止印刷，已印过的也要停止发行。教育部应积极组织力量，重新编写中学各科教材，包括小学教材。同时指示：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老三篇”以及其他适合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从此揭开“停课闹革命”、全面否定原有教材的序幕。为便于教学，一些地方将毛主席语录印成通常使用的教材标准32开本，作为学校的正式教材。

2.“复课闹革命”，各地自编“红色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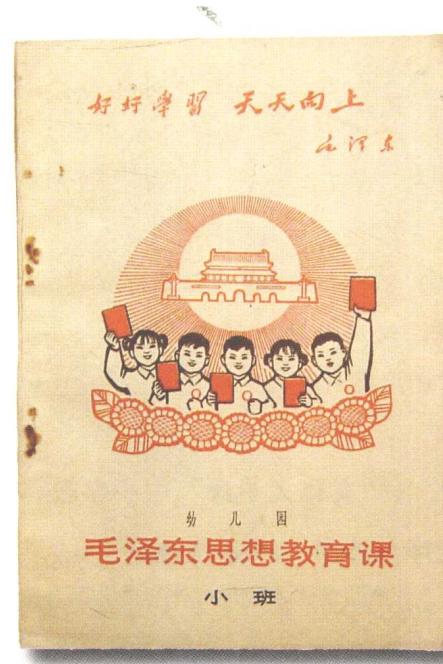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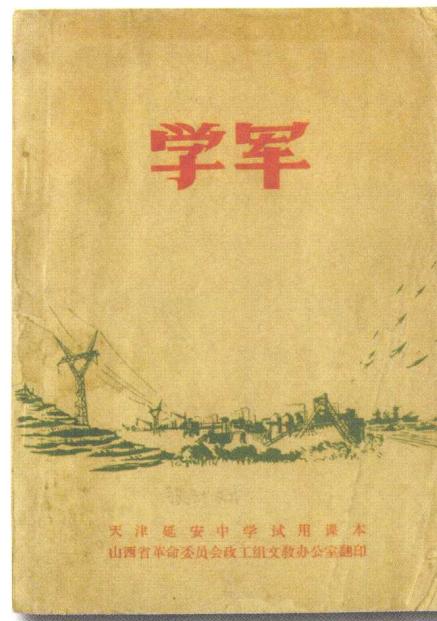
1967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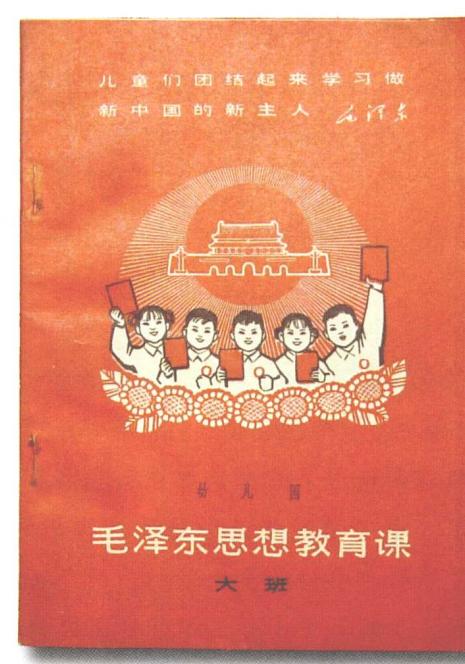
号召“复课闹革命”，并提出由师生自订方案、自定课程、自选教学内容、自编教材，集中力量进行本校的斗、批、改。于是各地急迫需要“复课闹革命”的课本。秉承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要删繁就简”的指示，从1967年开始，全国各省（市、区）相继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大规模地展开了中小学自编教材的工作。

第一，暂用课本。196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在全国最早成立，编写过渡性的暂用课本，主要集中在1967年9月左右出版，供1967年下半年“复课闹革命”暂用。其中中学暂用《工农业基础知识》课本，首次作为取代《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课本出现。此时，全国各地的课本大都冠以“暂用”名称，只有北京、辽宁等地用“试用课本”。1967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天津延安中学是怎样“复课闹革命”、改革教材的，“革命师生们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政治课、语文课都讲毛主席著作。外语课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及战时所需的对敌喊话等，一些知识课也都突出了毛主席思想”。这一做法对全国影响很大。

第二，试用课本。“复课闹革命”的后期，1969年至1971年间，各地的过渡性质的暂用课本完成使命，新的“试用课本”在全国各省市开始编写，并作为学校比较正式的课本在学校中试用。试用课本接替暂用课本，是随着学校教育



从停课到复课到基本稳定的教学秩序的产物。此时，中小学课本的变化之一是，出现了崭新的课本——《毛泽东思想教育课》，甚至连幼儿园都使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课》课本（上海就分小班和大班两种）。《毛泽东思想教育课》主要以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为基本教材，以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文章等为辅助教材。1969年1月27日，《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文章，介绍兰州第五中学实行半工半读的经验，把原来中学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即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课。从此以后，全国不少城市中学也实行了类似课程。全国的情况是：有的地区一度把政治、语文、历史三科合并为毛泽东思想课本，以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为基本教材；多数地区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改设“工业基



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强调“典型产品带教学”，物理学部分讲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化学部分讲土壤、农药、化肥，生物部分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体育改为军体课，以军训代替体育；音乐、美术合并为革命文艺课等。

3. 整顿教育，恢复基础的教科书

随着政治运动惊涛骇浪的此起彼伏，课本本身也上演了一场“回潮”与“反回潮”的政治斗争。

“九一三事件”后，各级各类学校率先开始了教育整顿，而且整顿的第一炮就是对准文化课教学、基础理论教育等教育质量方面的问题。1972年3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加强领导，认真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一文。文章说：“不少单位出现了政治与业务分离的、形‘左’实右的倾向。有些教师不敢抓智育，不敢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学生的基础知识较差。”1972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苏州地区教材编写组的文章《正确处理编写教材中几个关系的问题》，从政治教育与基础知识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体系问题等方面探讨如何编写新教材。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提高质量成为1971至1972年整顿教育的一个突出方面，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教育领域里的一些有效措施，加强文化课教学。反映到课本上，一是恢复编写了一些传统教科书，如一些地方恢复编写化学、物理、地理、历史等教材；二是增加了基础知识的分量。

4. “反右倾回潮”的教科书

1971年底开始“批林整风”运动，教育领域也进行了纠偏工作，但到1972年底，决策层转而开始以“反右倾回潮”“批林批孔”取代“批林整风”，全国形势骤然逆转。《文汇报》于1972年11月连续发表《这样提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批判“基础风”“理论风”的文章，把提倡基础理论、重视基础知识认为是“资产阶级右倾回潮”。1973年底1974年初，国务院科教组先后三次召开了教育革命座谈会，在教育路线上试图把“批林”的极“左”路线，扭转至“批林”的极右路线，认为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回潮”现象，要“向着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开展新的进攻”，要“打退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猖狂进攻”，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指示，对现行教材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修订，有的要重写。这以后的课本重新回到“复课闹革命”时期的老路：以毛泽东思想统帅课本和从工农业生产实际出发编写课本。

1967至1976年，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小学教材体系遭到极大的破坏，教材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呈现出全方位无序的格局。

三、中小学教科书建设的发展、改革和繁荣（1977—2009）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时期，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乘着改革





开放的劲风，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1. 改革开放初期教科书的恢复与规范（1977—1984）

中小学通用教科书迅速出版

1977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①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迅速启动全国通用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

1977年12月20—28日，教育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河北涿县联合召开全国教材出版工作会议，指出今后由教育部负责统编中小学教材，计划在3年内完成，其中1978年秋季中小学一年级和部分课程的统编教材共22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供应纸型，分省印制发行，在1978年秋季开学前完成。暂无统编教材的各课程，仍由地方组织力量，参照统编教材的编写大纲编写出版，乡土教材和补充教材，由各省自行编写出版。^②

1978年1月颁发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各科教材的第一册1978年秋季在全国使用。后续各册逐年更替，到1980年这套教材基本编完。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发现十年制教



学计划在课程设置等方面需要修订，因此，1981年教育部又颁发了《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对全日制十年制小学教材进行修订，并编写五年制教材。

1981年4月，教育部根据邓小平“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指示精神，颁发了《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1984年，又颁布了《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农村）小学教学计划》和《全日制六年制城市小学教学计划（草案）》。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编写六年制中小学教材。

各类中小学教学改革实验教科书异彩纷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教育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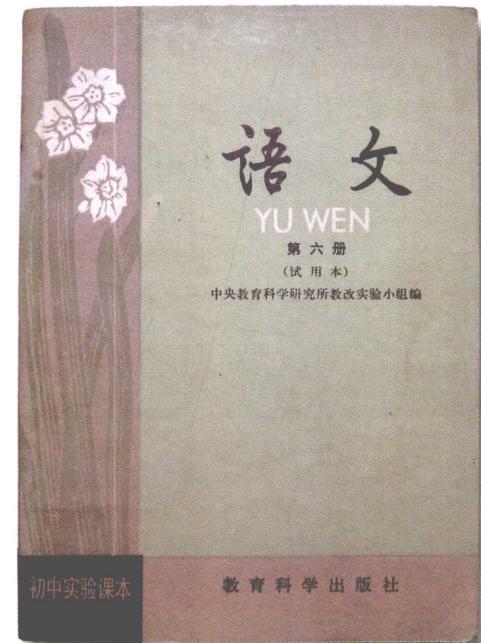
教材的全国高度统一，已经不适应实际需要，也不利于教材质量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教材政策的改革也势在必行。各地开创性地试编了各种不同的试验教材，使教材趋于多样化，丰富、发展了教科书体系。比较有影响的有：



①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2.

②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报告的通知[EB/OL].http://www.

people.com.cn/item/f1fgk/gwyfg/1978/112701197804.html



学制编写的六年制重点中学数学实验教材等。此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景山学校都编有小学语文和数学的实验课本。

由于全国通用十年制教材试用以后，多数地区、学校和师生反映教育内容“深、难、重”，难以完成教学任务。1983年，教育部针对数理化等教科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普遍感觉内容深、难、重这一突出弊端，发布了《关于颁发高中数学、物理、化学三科两种要求的教学纲要的

由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四个城市联合编写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和数学课本；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改实验小组编制的六年制重点中学语文实验教材；由教育部委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编写的和由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按照五四三

通知》，通知指出，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学科供应适合较高教学要求的甲种本和适合基本教学要求的乙种本。

1978至1984年，教材建设得以恢复并不断实验，教材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与能力的培养，但出现了“难、深、重”的倾向。

2. 义务教育实施后中小学教科书的多样与实验（1985—2000）

为在全国有步骤地普及义务教育，适应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义务教育的需要，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提升教科书编写质量，国家教委确定了教材审定制：“改革现行的教材编审制度，把编、审分开，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种风格。鼓励各个地方、高等学校、科研单位、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统一的基本要求参加编写教材，允许在教材的内容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有不同的风格。”^① 1985年1月11日，教育部颁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指出：今后中小学教材建设，把编写和审查分开，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供各地选用。这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由“一纲一本”的统编通用制改革为“一纲多本”的竞编选用制。这是我国教材建设史上的重大变革。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由此迈出了新的步伐。

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

1988年5月，国家教委颁发《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包括六三制和五四制两种）和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学大纲初审稿。从1989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九年制全日制小学和初级中学各科教学大纲（初审稿）”为依据编写了义务教育六三制和五四制两种教材。1990年秋季开始，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些市、县、区进行实验。

1992年8月国家教委正式颁发《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中课程计划（试行）》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共24科教学大纲（试用）。1993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新大纲重新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五四”“六三”两种学制）的教科书，开始在全国使用。

八套半实验教科书的尝试

1988年8月《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正式颁发，根据这一规划方案，国家教委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十多家单位和地区筹备、组织编写多种教材，并明确提出要按不同风格、不同层次，供全国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学校使用。当时出现了所谓“八套半教材”。这些教材于1989年开始实验，1992年开始逐年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1993年9月在中小学的起始年级不同程度的使用。

^①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教材制度沿革篇（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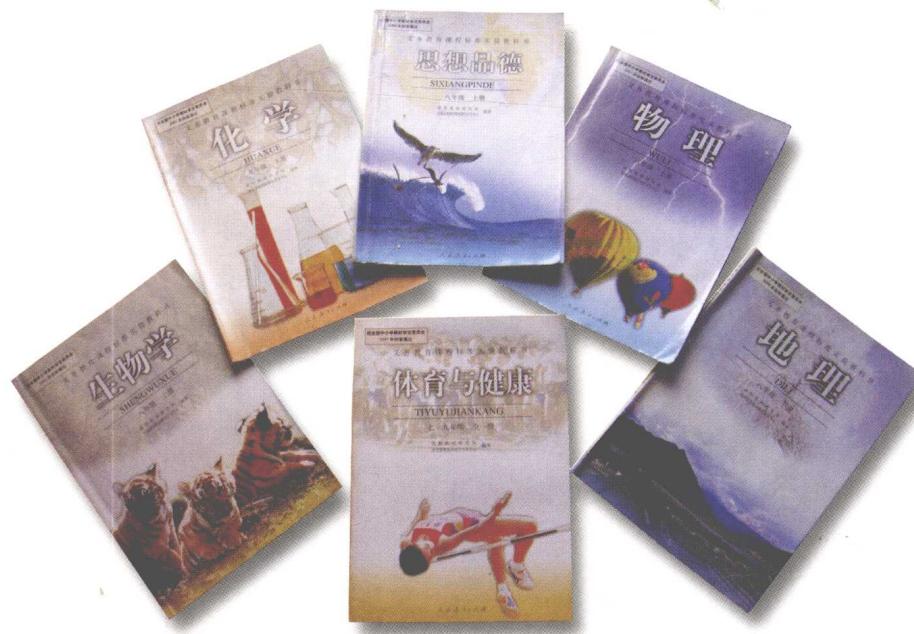
乡土教材异彩纷呈

国家教委于1987年6月3日—7日在浙江省召开了全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研究确定了乡土教材编写的方针、内容范围，以及有关政策问题。到1990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各地编写的乡土教材达2000种以上，包括地理、历史、生物、思想品德、音乐、美术等学科，涉及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

1985至1999年，中小学教材建设从编审合一到编审分离，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多纲多本，实施教材多样化方针，打破了全国中小学基本上使用同一套统编教材的局面，使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情况选用不同层次的教材，新中国教材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教材不但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且标志我国教材发展机制的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3.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科书的繁荣与兴盛（2001—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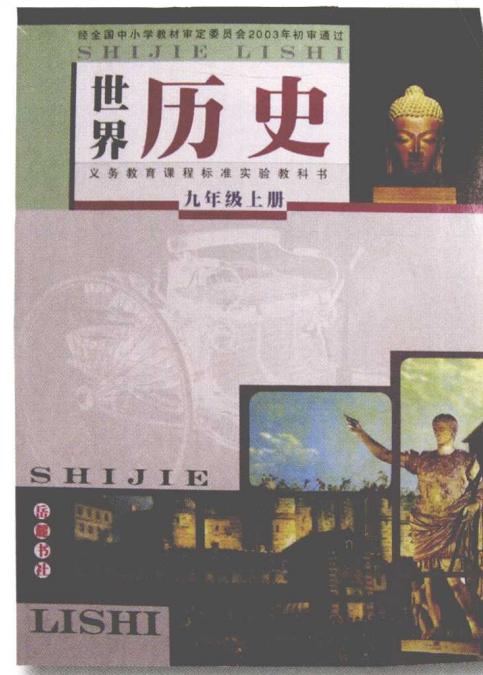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发〔1999〕9号）提出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001年7月，国务院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完善基础教育教材管理制度，实现教材的高质量与多样化。”“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随着《纲要》的实施及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的相继颁布，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教育科学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等相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年鉴 [EB/OL].<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65/info25165.htm>

继投标编撰中小学教材，教材编写与出版发行群雄逐鹿的时代来临。

2001年9月，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首次在全国38个国家级实验区试



用。截至2009年春，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其中包括六三学制小学10个学科115套、初中19个学科116套；五四学制小学7个学科10套、初中11个学科20套；普通高中18个学科72套。

2003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语文等15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高中从2004年开始进入实验阶段。为顺利推进新课程实验，教育部组织编写并审查通过了14个学科274册教材供实验区学校选用。^①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启动，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随着多套教材的审查通过并试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开始在教材建设中发挥作用，教材建设出现了生机勃勃、蓬勃发展的喜人局面。各套教材在比较中求质量，在竞争中求发展，促进了教材编写和出版质量的提高。教材注重体现由“知识本位”向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转变，注重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等，教材编写的科学性明显提高。教材从用纸到印刷，从封页到插图都非常讲究，出版者通过丰富多彩的栏目设计、优美生动的语言文字，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质量得到了整体提升，中小学教材建设进入空前繁荣时期。

四、少数民族语言的教科书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中小学教材建设是新中国教材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及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将党的这一民族语文政策载入了我国的第一部



宪法之中，这部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②1951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少数民族教育课程与教材问题既要照顾民族特点，又不能忽视整个国家教育的统一性。这一时期，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小学、中学开始着手建设少数民族教育课程体系和民族文字教材，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1956年6月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少数民族教育要赶上汉族水平。为此各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应译用或采用全国通用教材，另外自编本民族语文教材和民族学校汉语教材及民族补充教材。在这一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民族地区学校课程进行了相应

改革，除本民族语文教材建设外，开始编译比较完整的民族文字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③

1973年国务院科教组委托内蒙古自治区召开黑龙江、辽宁、吉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八省区中小学教材工作座谈会，成立八省区蒙文教材协作组。1974年9月，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工作座谈会，就少数民族教育的课程和教材问题进行了研讨，尤其对少数民族教材的编译、出版和印刷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在此精神的鼓舞下，八省区蒙文协作、五省区藏文协作、三省区哈文协作、东北三省朝文协作的工作开始有所进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的课程建设和改革奠定了基础。



^{①②} 转引自：塔伊尔江. 试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 [J]. 新疆社会经济, 1998(2):63

^③ 孟凡丽. 我国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回顾与反思 [M]. 贵州民族研究, 2004(4):127

1987年2月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九省区教育体制改革进展情况通报》又一次强调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建设，在统一基本教学要求的前提下，教学内容要充分体现当地民族的特点，编写出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补充教材，教学要求要符合少数民族儿童知识水平、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和选用的规定》明确说明“以民族文字编写的国家教委制定的课程计划所规定的必修课（劳动课、劳动技术课、职业指导课除外）各学科教材，省区间写作编译的民族文字教材，须由国家教委审批”。为了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2001年，应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藏族教育协作领导小组的请求，由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牵头，在西藏和青海有关编译部门的配合下共同编写了藏族地区汉语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包括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和三年制初级中学《汉语》教科书，共18册。^①2004年6月17日，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建设，完善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编写审查的管理，提高教材的编审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国发〔2002〕14号）和《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11号）精神和民族文字教材建设的实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教民厅〔2004〕5），规定“民族文字教材编写实行核准与备案制”（第五条），“民族文字教材审查，实行教育部和省、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教育部负责跨省、自治区使用的民族文字教材审查管理，省、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省、自治区使用的课程教材审查管理”（第六条）。同时“为了鼓励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每4年进行一次优秀民族文字教材评奖活动”（第十八条）。^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年鉴 [EB/OL].http://www.edu.cn/20060111/3170119.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EB/OL].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06/info6506.htm

目录 CONTENTS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BAINTIAN ZHONGGUO JIAOKESHU TUSHUO



- 新中国60年教科书发展概述---001
- 第一章 过渡时期的教科书---002
- 第二章 统一和“苏化”时期的教科书---072
- 第三章 全面探索时期的教科书---108
- 第四章 重新统一时期的教科书---134
- 第五章 “停课”与“复课”期间的教科书---148
- 第六章 “回潮”与“反回潮”期间的教科书---222
- 第七章 拨乱反正时期的教科书---262
- 第八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教科书---286
- 第九章 多样化与繁荣时期的教科书---312
- 第十章 新课程改革时期的教科书---354
- 第十一章 少数民族教科书---446
- 后记---465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